

媒介化视角下第二代乡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及治理

张雪霖

摘要:伴随农民工代际更替,乡村留守儿童呈现出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演化,其社会化过程中的困境日益凸显。研究基于媒介化理论视角,通过对鄂、辽、粤三省的田野调查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相关困境,其根源并非单纯的亲子分离,还在于智能手机作为“元媒介”深度嵌入并系统性地重构其社会化的生态系统。数字媒介的算法逻辑与即时反馈机制,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镇化及村庄空心化等社会变迁相互交织,在家庭、学校与村庄三大核心场域中呈现出“补偿”与“异化”并存的双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已成为形塑留守儿童社会化路径的关键结构性力量。因此,应对其社会化困境需超越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归责范式,转向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的“媒介化治理”新路径,方能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包容性的支持环境。

关键词:智能手机;媒介化;留守儿童;社会化;家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3-00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06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诞生了农民工群体。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城市化,即半城市化路径^[1],农民工只是进城打工挣钱,相当部分无法实现在城市安家立足,形成了独特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和留守儿童现象^[2]。农民工父母进城务工,他们的孩子一般放在村中委托祖辈进行隔代抚育,形成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3]。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工群体也经历了代际更替,从以 60 后和 70 后为主的第一代农民工,向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的第二代农民工转变。伴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乡村留守儿童也从以 80 后和 90 后为主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向以 00 后和 10 后为主的第二代留守儿童转变。

城市市民家庭一般在生活的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儿童抚育的难点主要是父母工作和带孩子的时间冲突,因此形成的是祖代参与辅助抚育的模式。而乡村农民家庭到城市务工,常在低端的非正规或半正规经济中就业,收入相对较低,难以支撑全家进城的生活,但在乡村务农的收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又不得不外出进城务工,因此被迫形成家庭结构的时空分离,由祖辈替代父母进行隔代抚育,便产生了大量乡村留守儿童。家庭被认为是实现儿童社会化的初级组织^[4]¹⁵⁷,其结构和功能的残缺,也被普遍认为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因此乡村留守儿童现象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关于留守儿童的定义,其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将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的儿童都定义为留守儿童;从狭义来说,只有将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的儿童才被界定为留守儿童。有学者研究发现,只有当父母双方同时外出时间较长时,才会对孩子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5]。因此,本研究采用狭义的内涵,将乡村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长期不在身边、由祖代

进行隔代抚育的儿童,为叙述的方便,下文简称“留守儿童”。

调研发现,第一代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并未遭遇明显的社会化困境,亲代抚育的儿童和隔代抚育的儿童在相关方面并没有出现太大差异。然而,近年来,由隔代抚育的第二代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更容易成为“问题儿童”,如出现学习成绩下滑、行为失范、心理问题频发等现象。为何同样面临父母缺位与隔代抚育,两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代留守儿童遭遇的社会化困境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媒介使用对留守儿童社会化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1. 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困境与挑战

既有研究主要从家庭视角出发,将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归因于亲子分离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与功能残缺。具体而言,家庭被认为是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场所,而亲子陪伴与教育的缺失带来的家庭残缺与留守儿童不良的人格、学绩和行为高度相关^[6]。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远距离长期外出务工,会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下降^[7]。同时,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产生影响^[8]。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生活压力与孤独感较高,心理资本与幸福感较低^[9],心理抑郁的风险也较高^[10]。也有学者指出,与农村一般儿童相比,童年期的留守经历容易形成退缩型人格^[11]。亲子分离在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情绪、学习成绩和主观幸福感五个方面对留守儿童造成影响^[12]。既有研究主要依据 Bowlby 的依恋理论^{[13]177-209} 和 Olson 的家庭功能理论^[14],认为亲子关系在场和家庭时间的投入对儿童社会化起关键作用,从而将问题的根源指向父母外出与家庭责任的缺失。然而,这一范式难以解释一个关键的经验悖论:同样面临父母缺位与隔代抚育,为何第一代留守儿童和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出现差异化结局。这表明,仅从微观家庭视角归因,无法充分回应社会变迁与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存在解释力上的局限。

2. 媒介使用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传播学等领域开始关注数字媒介这一新变量,既有研究呈现出媒介“赋权”与“致瘾”的二元论争。积极论者认为,智能手机通过对留守儿童家庭代际传播时空的重塑^[15],可以实现远程媒介化抚育,其中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远程代际合作过程^[16]。借用手机,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实现远距离“做家庭”的功能^[17]。而且,网络媒介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水平^[18]。因为智能手机基于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本三维度发挥数字代偿功能,使得留守儿童在虚拟情境下的情感社会化成为可能^[19]。留守儿童玩手机游戏更多基于社交需求,手机游戏如同“益生菌”一般,发挥着活化社交、补偿情感、抑制生活无意义的潜功能^[20]。相反,消极论者指出,留守儿童存在网络素养较低、娱乐行为偏高而信息利用不足的问题^[21]。智能手机的使用,容易导致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游戏、短视频成瘾^[22]等问题,电子“益生菌”演化为电子“海洛因”。由于亲子两代媒介素养的差异,限制了智能手机在亲子远距离沟通中的作用^[23]。针对留守儿童存在的“数字成瘾”倾向,留守儿童与父母和祖辈之间掀起了手机争夺战,容易引发代际冲突和家庭秩序的失衡^[24]。留守儿童父母的媒介干预往往是“徒劳无功”的^[25],因此父母的媒介干预路径常常陷入困境^[26]。既有研究大多将数字媒介视为中性的沟通工具,讨论其如何“影响”留守儿童,而未将其置于更宏阔的社会变迁与技术社会互动中审视。

3. 对既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理论对话

既有研究为理解留守儿童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在解释当下困境时显现出其局限性。要深入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生成机制,需要一个能够整合媒介技术逻辑与社会变迁、强调系统性与结构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本研究引入媒介化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形塑社会互动、文化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力量。正如施蒂格·夏瓦指出“媒介化已然成为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同等的社会力量”^{[27]39},媒介化指的是不断增长的媒介影响所带来的社会与文

化机制及互动模式的改变^[27]²³。尼克·库尔德利等指出“媒介环境及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基础设施,如今已成为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思虑的互动世界的一部分……社会化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社会化在其基本方面已经变得媒介化”^[28]¹⁸⁵。虽然媒介化理论内部被划分为两条主要路径:一是以夏瓦为代表的制度化研究传统,即将媒介视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化力量”;二是以库尔德利和赫普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即以“互型”为核心概念分析日常实践与媒介在相互交织中共建社会现实^[29]。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将媒介化视为一个深刻的“元过程”。本研究借此与既有相关理论范式展开深入对话,旨在说明为何选择媒介化理论作为分析视角。

首先,与“数字鸿沟”理论的对话,旨在推进其解释层次。数字鸿沟研究历经 20 余年发展,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物理接入沟(第一道鸿沟),演进至使用技能沟(第二道鸿沟),并进一步拓展至知识获益沟(第三道鸿沟)^[30]。该理论对第二、三道鸿沟的研究,常将困境归因于个体或家庭的数字素养低与资源匮乏^[31]。本研究认同数字不平等的重要性,但认为若仅止步于此,则可能将由技术与社会转型复合而成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化约为个体能力问题,从而遮蔽了技术背后的算法逻辑,以及平台经济与宏观社会变迁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系统性压力。

其次,与“媒介环境学”的呼应,旨在拓展其经验边界。媒介环境学将媒介视为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视角极具启发性。媒介化理论也将媒介看作是社会的生态环境,“媒介作为社会生态”的研究被认为可以提供更大的理论想象空间^[32]。本研究承接此视角,但进一步指出,抽象的“媒介环境”需与中国特定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相结合,才能具体阐释其对特定群体(如留守儿童)的差异化形塑机制。本研究通过经验分析具体揭示了媒介生态并非均质地发挥作用,而是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镇化、村庄空心化等中国特定的社会进程相互交织,共同改写了留守儿童的成长脚本。

最后,与“童年社会学”的契合,旨在深化其结构分析。童年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旧”童年社会学向“新”童年社会学的范式革命^[33]。“旧”范式将童年视为一个普遍的、生物性的准备阶段,而新童年社会学则认为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儿童是能动的行动者^[34]。然而,新童年社会学在研究数字媒介如何中介童年时,存在两点尚未充分探讨的盲区:一是对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力量”剖析不足。在面对智能手机等“元媒介”时,其分析往往集中于儿童个体的媒介使用实践^[35],对于媒介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何作为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系统性地重塑儿童行动的社会生态,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二是对“能动性”与“结构”的辩证关系处理简单化。该范式虽成功打破了“决定论”,但有时又可能滑向“唯意志论”。本研究在承接新童年社会学能动性视角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拓展分析媒介技术如何与社会结构变迁交织互动,共同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生态系统”。

(二) 分析框架:留守儿童社会化生态系统的媒介化重塑

传统上,家庭、学校与村庄被视为实现农村儿童社会化的三大核心场域。家庭承担情感培育、价值奠基的初级社会化功能;学校进行系统化知识传授与社会规训的次级社会化;村庄则提供习得地方性知识、建立初步社会关系与获得归属感的重要环境。然而,在数字媒介,尤其是智能手机深度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这一传统的社会化理论范式在解释力上显现出不足。其理论预设主要基于面对面的、具身性的互动情境,难以充分回应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现实:数字媒介已不仅仅是社会化的工具,其内在的算法逻辑、即时反馈与虚拟在场等特性,正在系统性地改写儿童社会化的条件、过程与生态。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一“媒介化”进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城镇化、村庄空心化等宏观社会变迁紧密交织,共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复杂的社会化生态系统。由于当前儿童成长面临的社会化生态有很大变化,留守儿童开始出现一些新问题和新困境^[36]。

因此,为深入解释第二代留守儿童所呈现的、区别于第一代的系统性困境,本研究提出“留守儿童社会化生态系统的媒介化重塑”这一总体分析框架。本框架的核心是: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根源,并非单一的亲子分离,而在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元媒介”,其媒介逻辑作为一种关键的结构性力量,与上述宏观社会变迁相互嵌合、彼此强化,共同系统性地重构了留守儿童社会化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当短视频、手游、社交 App 成为留守儿童主要的情感寄托载体时^[37],传统社会化理论中家庭、

学校、村庄的三角支撑结构已被深度媒介化的生态系统颠覆。不同于媒介文本分析路径,库尔德利提出应走向媒介实践研究范式^{[38][38-42]}。因此,本研究将在媒介化理论视角下,从媒介实践研究路径出发,分析在家庭、学校与村庄这三大传统社会化核心场域中,数字媒介实践如何与既有的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从而扭曲、削弱或转移了各场域原有的社会化功能,从而加剧了父母缺位带来的脆弱性,最终导致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凸显。这一框架超越了将问题归因于家庭缺失或个体媒介使用的简单化解释,强调一种“技术—社会”互构的系统性视角,从而为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独特的成长困境,并寻求超越“家庭中心主义”的治理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究第二代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生成机制,特别是数字媒介在其中扮演的结构性角色,本研究采用了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团队于2023年4月、2023年7月及2024年7月,分赴湖北省L县S镇、辽宁省C市C区H镇、广东省Z市A区Z镇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田野点开展调查,累计调研47天。^①本研究选取鄂、辽、粤三省的两个乡镇作为田野点,旨在涵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地区,以增强研究的代表性与解释力。研究通过目的性抽样,广泛访谈与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的多元主体,共完成77人次的深度访谈。主要受访者为:(1)学校教师8人,包括校长、班主任与普通教师,涵盖小学和初中;(2)留守儿童11人,年龄6~15岁,父母均外出务工;(3)非留守儿童13人,年龄与留守儿童相仿,父母至少一方在家;(4)祖辈监护人15人,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年龄55~78岁;(5)在乡陪读父母16人,主要为母亲,在家专职陪读;(6)村组干部14人,包括村书记、主任、妇女主任等。同时,笔者通过参与学校的家长会、村庄活动,以及对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的观察,作为访谈资料的重要补充。

影响留守儿童社会化结果的因素是多元且复杂的,包括家庭经济资本、个体心理特质、村庄文化传统、宏观政策制度等。本研究并非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旨在通过聚焦于“媒介使用”这一在代际比较中差异显著且日益关键的新变量,揭示其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独特运作逻辑。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质性研究,其核心目的并非验证普遍的因果关系,而是致力于揭示数字媒介的逻辑如何嵌入并重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生态系统这一具体过程与内在机制。通过这种聚焦,本研究试图为理解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独特挑战提供一个基于“技术—社会”互构的媒介化分析视角。

四、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西部乡村劳动力前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乡村社会出现了隔代抚育的留守儿童现象。伴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留守儿童也出现了代际更替,从以80后和90后为主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向以00后和10后为主的第二代留守儿童转变。这里留守儿童的代际演化是根据笔者基于全国多地调研经验而作的理想类型提炼,其中代际时间节点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劳动力进入全国务工市场的早晚会有一定的提前或延迟。换言之,适当提前的地区,大致1995年以后出生的儿童留守经历跟之前的留守儿童逐渐不一样,即可归入到第二代留守儿童中。而适当推迟的地区,则可能到2005年以后出生的儿童留守经历才开始发生变化,才算得上第二代留守儿童。因此,本研究讨论的重点不在于留守儿童代际演化的时间节点和年龄区分,而在于指出代际变迁的事实与演化差异。

(一)第一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不显著

第一代留守儿童,虽然父母外出务工,在村里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面对父母陪伴的缺失,但是当时的大部分留守儿童并没有强烈的缺失感。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留守儿童并不意味着学习成绩不好,也不意味着行为习惯不好,也不存在所谓的性格、人格与心理健

^①按照学术规范,本文对县以下的地名和人名均作了匿名化处理。

康问题,也没有现在的抑郁问题。从乡村社会内生的视角来看,不管是留守儿童自身,还是乡村学校的老师,抑或村庄其他成员,都没有将留守儿童特殊化和标签化。正如下面的案例1和案例2,虽为个体经历,但反映了童年成长生态的代际差异共性问题。

案例1:L县G村的小红,1989年生,有一个1987年的姐姐和一个1995年的弟弟。她说自己姊妹三人都是留守儿童。自己和姐姐当留守儿童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当时村里一起玩的玩伴和同学较多,每天一起上山去砍柴、挖野菜,一起玩丢沙包、跳橡皮筋等,童年过得还是很快乐。父母不在身边也不觉得有什么缺失。但是,自己的弟弟感觉开始有点不一样,他长大后跟父母聊天时才说,上学时多希望父母陪在身边,父母不在身边还是有缺失感。

小红娘家所在的村庄属于山区,农业剩余较少,当地农民外出务工也比较早。小红和姐姐作为留守儿童,并没有感觉到父母不在身边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跟固定的玩伴一起愉快地度过的。当时村里的孩子都是在村小学上学,村里的同龄人、发小和同学基本上是重合的,他们不仅一起上下学,放学后的闲暇时光也会一起玩,甚至是天天不着家的疯玩。

案例2:L县S镇X村的小丁,1995年生,还有一个2006年出生的妹妹。她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感觉跟妹妹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自己小时候,店里也比较忙,没空管我。当时镇上就一条街,跟着小伙伴们天天从街头玩到街尾。早中晚上学,也都不用家长接送,出门一吆喝,十来个玩伴一起上下学,当时家家户户门都是敞开的,而且父亲有五兄弟,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们众多,也经常一起玩。一起玩的伙伴有父母都在家的,也有都不在家或一方外出的,没有感觉到有啥区别,反正都是一起玩。其中从三四岁记事开始便一起玩的四个发小,从小一直玩到现在,建的有4个人的微信群,20多年的好朋友了。但是妹妹的成长经历跟自己不太一样,目前在读高二,放学一回家,一个手机、一个平板、一包零食,仿佛就种在沙发上了。村里很少有她的同学,没有一起玩的,可能是通过手机、平板跟朋友联络感情。

案例2中小丁与妹妹的成长经历对比,清晰揭示了儿童社会化生态的系统性变迁。小丁的童年依托于地理上紧凑、社会关系紧密的实体村庄。开放的街道、敞开的大门、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以及稳定的同辈玩伴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自发且高度“在场”的线下社会化空间。然而,其妹妹的成长环境已截然不同:村庄的线下社交生态已然凋敝,固定的玩伴群体消失,面对面的疯玩被屏幕前的独处所取代。她的社交与情感联结很大程度上“迁移”至数字媒介之中。这种从“群体性线下社交”到“个体化线上互动”的转变,标志着支撑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显性生成

第一代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并未呈现出系统性差异。然而,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开始被系统地标签化和问题化,与非留守儿童群体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边界。这种社会化困境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体现在可观察的行为表现、学业成绩及心理状态等多个维度。正如S镇村妇女主任小燕的直观感受:“在一群孩子里,现在真的能一眼看出哪个是留守儿童。不是说衣服穿得多差,而是那种状态——眼神有点躲闪,不怎么爱叫人,要么特别蔫儿,要么就突然很躁动。你上去一问,十有八九,爸妈都在外面打工。”

这种社会化困境具体表现为:其一,行为失范现象更易发生。如吸烟、逃学、校园欺凌等行为在留守儿童中出现概率更高(见案例3)。其二,学业表现普遍滞后。班级成绩排名后段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占绝大多数(见案例4)。其三,心理与情感状态表征异常,容易表现出内向、孤僻、自卑或难以管教的暴躁情绪(见案例5)。其四,智能手机沉迷问题尤为突出,如沉迷于短视频和游戏,甚至出现高额直播打赏等非理性行为(见案例6)。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内生视角下第二代留守儿童被标签化的经验基础。这些案例虽为个体经历,但其所反映的行为模式、情感状态及困境机制,在田野调查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能够揭示第二代留守儿童面临的共性问题。

案例3:S镇中学教师小雷,他目前是七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班里共有40多名学生,其中5人属于自觉学习,父母在身边或至少有一方在身边;10人左右需要靠家长监督才可以好好学习;

垫底的1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家长不管的。他说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成绩基本上都不好。七年级的学生,刚读初中还比较听话,到了八九年级,觉得自己是学校的大哥了,就有少部分学生开始学抽烟、打架,这种90%以上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或留守儿童。

案例4:S镇X村的丁颜橙,2012年出生,11岁,上小学五年级,班里同学50人。她告诉笔者,她们班里经常不做作业的有15个同学左右,其中只有1个不属于留守儿童,另外14个左右都是由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

案例5:S镇X村的小谷,男,2011年出生,12岁,上小学六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平时由爷爷奶奶带。放学后整天沉迷手机游戏,不让玩就大吼大叫,脾气暴躁,爷爷奶奶管不住。笔者实地去这个小男孩家访谈,刚跟他接触时,发现他的头会不自觉地晃动,不愿意讲话,神态似乎有点不正常。整个沟通过程也很不顺畅,他很抗拒跟人聊天,喜欢一个人在屋里打游戏。

案例6:S镇X村的小女孩小兰,2012年出生,11岁,上小学五年级,父母外出务工,在村里由爷爷奶带。她沉迷于刷抖音短视频,在抖音直播间刷礼物刷了1万多元,被家人发现后,请村干部帮忙报警处理,才追回了部分钱财。

案例4呈现了学生也已经有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区分的意识,她主动告诉笔者班里大部分不写作业的都是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而案例5和案例6属于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游戏和短视频的典型个案,性格上都有点内向、封闭,不喜欢与人交流,当前的第二代留守儿童已经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和被污名化,出现了问题化的趋势,容易成为“问题儿童”,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陷入困境。

五、媒介化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负向影响

本节将聚焦数字媒介如何深度渗透并系统性重构留守儿童社会化所依赖的三大核心场域。通过剖析家庭、学校、村庄在媒介化转型中的实践逻辑,揭示数字媒介非但没有弥合因家庭结构离散和社会变迁造成的缝隙,反而与这些脆弱性相互交织,强化了留守儿童面临的系统性困境。

(一) 媒介化对家庭场域的影响

过去乡村社会的粗放式育儿模式中,家庭功能侧重于生活照料,教育责任主要由学校承担。然而,数字媒介的普及重塑了亲密关系的理想图景,情感密集型的家庭叙事日益凸显^[39],使得家庭,尤其是父母,在子代教育与社会化中的责任被空前强化。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媒介化抚育”环境,其社会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数字代沟与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

在“教育责任家庭化”的趋势下,家校合作高度依赖数字媒介。第一代留守儿童时期,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乡村家长,普遍都认为孩子的教育主要是学校的事,家长对子代教育的卷入较少,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拼的主要是孩子的天赋和后天努力程度。父母在不在身边,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影响并不大。然而,到了第二代留守儿童,孩子学业成绩的好坏,则转变为主要比拼家长的参与和投入程度,正如案例7中两代人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投入的差异。该案例生动体现了代际间教育理念与投入的显著差异,是理解“教育责任家庭化”趋势及其对第二代留守儿童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缩影。

案例7:S镇小学教师小曼,大女儿桦桦7岁,上小学一年级。她坦言自己每天晚上都要陪闺女一起做作业。桦桦的姥姥看到后对小曼说:“哎呀,现在不是孩子在读书,是家长在读书啊。孩子坐3个小时,家长也要陪3个小时。你们小时候,我们哪里像你们这样管过。”

那么,对于第二代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在不在身边,对孩子学习成绩好坏的影响则很大。尤其是当前家校沟通与合作主要依赖数字媒介,而乡村祖辈监护人普遍面临“数字代沟”^①,导致家庭教育的功能在实践中被弱化。正如调研中一位辽宁H镇的祖父(68岁)无奈地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搞不来,孩子回来就说没作业,俺们也不知道真假。”还有一位在外务工的父亲(40岁)很气愤地说:“老师

^①“数字代沟”是数字鸿沟在代际维度上的表现,在本文中指祖辈的数字使用能力远不如孙辈。

每次都是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让家长把作业告诉孩子督促完成,我父母年龄大了搞不来这些,我每次都是让孩子到邻居家抄写作业任务。我就想明白了,老师为啥就不能放学后直接将作业布置给孩子,非要在群里说。有一次,实在没忍住,就在班级群里爆粗口了。”

乡村祖辈监护人普遍无法使用微信群、钉钉等 App 接收学校通知、辅导孩子作业,导致儿童在学业上被迫“自我负责”,相较而言会加剧留守儿童的教育劣势。同时,因乡村祖辈监护人的数字代沟导致其对孙辈的媒介使用行为知之甚少,既不了解其社交媒体账号,也难以识别网络风险。案例 6 中小兰在直播间豪掷万元的事件,正是这种数字监护真空的极端体现。数字媒介在赋予留守儿童虚拟世界入口的同时,也因家庭监护能力的缺失而埋下了安全隐患。

2. 亲子数字沟通与情感补偿的浅层化

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数字媒介本是弥补亲子分离的情感工具,但实践中却常常因亲子数字沟通的浅层化而陷入“情感补偿”的不足。留守儿童与在外务工的父母之间通过视频通话,沟通内容多局限于“吃饭没?”“考多少分?”等仪式化问答,难以进行深度的情感交流。正如辽宁 H 镇的一位 12 岁的留守儿童在访谈时低声说:“(和爸妈)没啥好讲的,说来说去就那几句。基本上就是问吃饭没、作业写了没、考试了吗。”手机屏幕传递了影像与声音,却无法传递触觉的安抚与具身性的陪伴,而祖辈往往无法感知儿童的非语言情绪线索。

父母在外工作,一般都是下班或有空了再给孩子打电话。当孩子有需求时,往往无法及时向父母求助并获得回应,这可能会强化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尤其是在与非留守儿童的横向比较中,他们更容易感到情感的缺失,以及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久而久之便会影响个体的性格。正如访谈的一位 14 岁的留守儿童说:“从小学开始,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上下学。每次遇到困难和无助的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也不知道向谁说。时间久了,就不想说了,慢慢地就形成了现在的性格。”

(二) 媒介化对学校场域的影响

学校作为核心的公共社会化机构,本应在留守儿童成长中扮演稳定器和补偿者的角色。然而,在当前乡村教育生态中,两重相互关联的进程正共同导致其功能的异化:一是宏观层面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结构性失衡,二是微观实践层面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

1. 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失衡

教育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与“资源”向城市的双重集聚。优秀教师向待遇更高、平台更好的城镇学校流动,而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则通过“陪读”等方式竭力将孩子送入城镇学校。这导致了乡村学校陷入“生源流失—师资弱化—质量下滑”的恶性循环,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结构性失衡日益凸显。以笔者调研的辽宁省 C 市 H 镇为例,由于乡村生源不断进城上学,村小经过一系列撤并改革,目前 H 镇只有 3 所小学,总共只有 500 多名学生。在 2000 年前后拉开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家庭被迫从以下两种路径做出艰难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均可能导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其一,若选择“进城读书”,则意味着家庭需承担高昂的经济成本与监护压力。祖辈往往需要离乡陪读,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面临生活孤立、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家庭支出大幅增加。对儿童而言,他们虽获得了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却被抛入一个竞争更激烈、比较范围更广的城市社会化场域。他们需要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城市儿童竞争,原有的乡村生活经验可能成为“污名化”的来源,身份认同与归属感面临挑战,社会化过程伴随着更高的心理成本与更剧烈的文化冲突。

其二,若选择“留乡读书”,则意味着默认“次优”甚至“剩余”的教育生态。乡村学校在优质资源被抽空后,不仅师资力量薄弱,更失去了以往由多元生源所营造的学习氛围与同伴激励。儿童所处的教育环境整体“贫瘠化”,其知识获取、视野开阔与认知发展面临结构性限制。他们虽避免了城市中的直接文化冲突,却被固化在一种低期望、弱竞争的社会化轨道上。因此,教育资源的上移迫使留守儿童家庭陷入“进城”与“留乡”的两难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化风险与成本。

2. 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

在上述结构性困境之上,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引发了一场“教育责任的媒介化转嫁”,其运作逻辑

辑在无形中加剧了两种路径下留守儿童的劣势。第一代留守儿童就读时,家校关系相对疏离,学校是教育责任的绝对主体。随着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系列改革,尤其是教育减负政策以及家校关系共建的提出,家校关系由疏离型向合作型转变。如今,家校互动日益依赖微信、钉钉等平台,数字媒介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家校沟通的效率,而教师的许多监督、辅导与沟通责任被“技术性转嫁”给家庭。这套模式默认所有家庭具备均等的数字接入能力、操作素养与时间精力。教师的行为逻辑演变为:群内发布任务→要求家长监督完成→默认家庭具备执行能力→祖辈操作失败→老师将责任归因于“家庭失职”→教育责任从公共机构向家庭转嫁。以下案例8中小学教师小丽的说法虽为个人意见,但也反映了当前教师的一种普遍隐而不彰的心态。

案例8:S镇小学教师小丽坦言:“作为老师,我不喜欢留守儿童家长,因为跟老人很难沟通,老人不认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不好发信息。现在开学会组建班级家长微信群,在群里会发布学校通知,布置学生作业,肯定要把家长扯进来,如默写、背书等作业要家长签名。家长敷衍我,也是敷衍自己的孩子。自己孩子的学业都不重视,我老师凭什么要重视你的孩子。因为家长参与辅导孩子作业的话,老师上课稍微省力些,学生也会成长得更好些。毕竟老师是一个人针对班里50个人,而家长是一对一。家长敷衍的话,把老师搞烦了,老师不管你家孩子。”

因此,这一媒介化逻辑系统性地排斥了媒介素养低的隔代监护家庭。对于进城陪读的祖辈,数字素养的缺乏使其难以有效融入城市学校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加剧了他们在城市教育系统中的边缘感。对于留在乡村的儿童与祖辈,他们面对的本就是负担过重、资源不足的乡村教师。当教师通过数字工具将更多责任下放时,本就无力应对的隔代监护家庭更容易被视为“不配合”,导致儿童在校获得的关注与支持进一步减少。那么,媒介化转型非但未能弥合城乡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反而通过建立一套精细化的数字门槛与责任转嫁机制,使城乡差距在微观互动中被日常化、合理化。其结果是留守儿童的家长无论怎样选择,都在一个被媒介化技术重塑的教育生态中处于系统性不利地位。

(三)媒介化对村庄场域的影响

学校场域发生的资源重组与责任转嫁,其影响深远地波及至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另一个基础性场域——村庄。村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乡村儿童构建同辈关系、习得社会规则、获得情感归属的重要社会化空间。然而,这一传统场域正在教育城镇化与数字媒介渗透的双重作用下被根本性重构,其核心表现为线下社交的萎缩与线上联结浅薄化的双重困境。

1. 线下社交的萎缩与“去地方化”

儿童从2岁多后开始对同龄伙伴和朋友关系产生兴趣,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对家庭和父母的亲密依恋关系权重不断下降,对朋友式亲密关系的需求不断上升。特别是到了青少年阶段,同伴和朋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跟他们建立亲密关系是青少年期的重要任务,对朋友自我表露的内容会多于对父母的表露^{[40]33}。因此,同辈群体在儿童,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中至关重要,是形成幸福感、学习社交技能、建立家庭之外的亲密关系的关键。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乡二元教育体制下,每个村庄都有小学,村里的儿童也都就近在本村上学,接着到本地乡镇上中学。那么,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一般也是自己的中小学同学,形成的是学缘和地缘高度重合的朋友关系。这类同辈群体社交关系的特征主要有:其一,人数较多。同龄人几乎都在村里上学,可以一起玩的人比较多。其二,互动密集、交往深度。不仅会一起上下学,在学校里一起上课,放学后在村里也会一起玩。其三,关系稳定。村庄里的儿童基本上自幼年起就天天在一起玩了,经过学龄前、小学和中学阶段,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一起玩的常常是同一批人,朋友关系的稳定性较强,正如案例2中的小丁。那么,对于第一代留守儿童而言,相对稳定的村庄共同体与“学缘—地缘”高度重合的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密集、稳定、深入的同辈互动与情感支持,有效缓冲了父母缺位的影响。然而,如前一节所述,教育城镇化进程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结构,使得基于“学缘—地缘”高度重合的、稳定的村庄同辈社群随之瓦解。孩子们分散到不同学校,放学后回归的是一个同龄伙伴稀缺的“孤独的村庄”。这导致第二代留守儿童线下同辈社交

的萎缩与“去地方化”,掏空了其社会化所依赖的一项关键的非正式支持系统,不仅加剧了孤独感,也使其寻求陪伴、认同与归属的线下渠道变得极为狭窄。

2. 线上联结的浅薄化与“液态”慰藉

正是线下社交的匮乏,为数字媒介的侵入提供了空间。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平台,凭借其精准的算法推荐与即时反馈机制,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补偿性虚拟社交空间。他们通过游戏组队、直播间互动等方式,建构临时的、功能性的线上关系,以寻求陪伴、认同感和情感慰藉,形成了社会互动的媒介化过程。然而,这种线上建构的归属感本质上是流动、浅层且不稳定的,如同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液态”的现代关系^{[41]23-25}。它难以提供线下面对面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信任、深度情感联结与全面社会支持。正如一位12岁留守儿童说:“通过打游戏组队,认识了很多网友,但每次都是系统随机匹配的,打游戏的过程中会聊天,但打完游戏一般就结束了。”而且算法塑造的“无限滚动”和轻易获得的即时满足,可能削弱他们在现实社交中所需的耐心,解决冲突的能力,更容易对需要付出努力的真实人际交往感到厌倦或挫折。因此,媒介提供的只是一种“液态”慰藉,它虽暂时填补了空虚,却无法真正弥补线下社会化支持的缺失,反而可能使第二代留守儿童陷入线下社交萎缩与线上联结浅薄化的双重困境,在虚拟世界中越陷越深,进一步脱离现实社会的互动。

六、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的治理路径

本研究通过对鄂、辽、粤三省的田野调查,从媒介化理论的视角考察了留守儿童的代际演化及其社会化困境。研究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化困境,并非简单地由亲子分离所致,而是数字媒介的逻辑深度嵌入并重塑其社会化生态系统的结果。智能手机作为“元媒介”,其与家庭结构离散化、教育责任转嫁、村庄共同体解体等社会变迁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留守儿童在家庭、学校与村庄场域中陷入系统性的社会化困境。

面对由隔代抚育带来的留守儿童社会化困境,当前呼吁“母职回归”的策略,本质仍是家庭责任强化的路径依赖。该路径下,乡村家庭不仅面临持续性的经济压力、强化传统性别分工的局限,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它将一个由技术中介引发的系统性困境窄化为家庭私域的责任。因此,应对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需超越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归责范式,构建一种系统性的“媒介化治理”新路径。该路径要求政府、学校、平台、村庄等多元主体,以协同共治为核心理念,共同回应数字媒介对儿童社会化进程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因此,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具体治理建议。

其一,规制平台算法逻辑。第一,推行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准则。建议针对主要网络平台,特别是短视频、社交及游戏应用的推荐算法,建立强制性的儿童模式算法披露机制。平台需定期公开在青少年模式下,内容推荐的基本逻辑、权重设置及数据使用情况,接受独立第三方评估。第二,探索“积极偏向”的内容推荐机制。算法不应仅是时间锁定与内容过滤,更应主动识别并向留守儿童用户推荐有利于其社会性发展、激发其学习兴趣、拓展其职业想象的高质量内容,将算法技术从“注意力收割者”转变为“成长引导者”。其二,重建学校教育的主体性与公共性。教育部门应明确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责任,规范家校沟通方式,严禁通过数字工具变相转嫁作业批改与辅导责任;应大力发展并延长课后在校托管服务,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普惠的教育支持,补偿其家庭辅导的缺失;以学校为枢纽打造“课后活力社区”,利用学校场地提供丰富的文体活动,系统性重建留守儿童基于现实互动的同辈群体社交。其三,实施“隔代监护人数字反哺”村庄行动,将提升祖辈的数字素养纳入乡村治理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核心工作。由村委会、学校协同,开展“手机课堂”工作坊,以“如何查看老师通知”“如何设置防沉迷”等实用技能为核心,进行手把手教学,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日常实践,缓解家庭内部的数字代际压力。

总之,第二代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是技术媒介逻辑与社会结构变迁深度互构的系统性产物。对其治理,必须采用与之匹配的、系统性的“媒介化治理”思路。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代际比较的视角和媒介化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这一困境的生成机制,并指出其解决之道必须从责备家庭的单一

逻辑,转向关照技术与社会复杂互动的系统思维。唯有通过媒介化治理的系统性举措,方能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由于研究样本量的限制,对于北方、西部等不同区域留守儿童的境遇及其区域差异比较尚显不足。其次,质性研究方法虽擅长过程与机制的“深描”,但在验证变量间普遍关系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和丰富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引入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以检验研究所发现机制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244.
- [2] 谭深.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 2011(1): 138-150.
- [3] 夏柱智, 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2): 117-137+207-208.
- [4] 波普诺. 社会学: 10 版. 李强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5] 陶然, 周敏慧. 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 管理世界, 2012(8): 68-77.
- [6] 范方, 桑标. 亲子教育缺失与“留守儿童”人格、学绩及行为问题. 心理科学, 2005(4): 855-858.
- [7] 胡枫, 李善同.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 5 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 2009(2): 67-74.
- [8] 崔颖, 徐卓君.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浙江学刊, 2021(5): 125-136.
- [9] 范兴华, 余思, 彭佳, 等. 留守儿童生活压力与孤独感、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2017(2): 388-394.
- [10] 范志宇, 吴岩. 亲子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抑郁、感恩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6): 734-742.
- [11] 刘志军. 留守经历与退缩型人格——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3): 40-56.
- [12] 唐有财, 符平.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 人口学刊, 2011(5): 41-49.
- [13]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volume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14] OLSON D H.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000, 22(2): 144-167.
- [15] 朱秀凌. 手机对青少年家庭代际传播时空的重塑. 编辑之友, 2015(9): 15-18.
- [16] 甘雨梅.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1): 85-102+128.
- [17] 吕山, 李熠, 林颖. 远距离“做家庭”: 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 新闻与写作, 2022(11): 92-106.
- [18] 张苏秋. 网络媒介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52-62.
- [19] 王清华, 郑欣. 数字代偿: 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 新闻界, 2022(3): 37-47+94.
- [20] 王清华, 郑欣. “电子益生菌”: 乡村留守儿童的手机游戏依赖及成因. 传媒观察, 2023(11): 22-31.
- [21] 安涛, 侯琦.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素养: 基于对照的实证研究.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8): 161-168.
- [22] 梁琦. 引导偏差与双向倒置: 农村留守儿童短视频成瘾研究. 天府新论, 2023(4): 118-131.
- [23] 胡春阳, 毛荻秋. 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 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 新闻大学, 2019(6): 57-70+123.
- [24] 刘王平, 郑欣. 手机争夺战: 智能设备监管与农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 新闻记者, 2022(8): 84-96.
- [25] 黎黎, 赵美荻, 李孟. “行之有效”还是“徒劳无功”——父母干预会降低孩子手机游戏成瘾吗? 新闻记者, 2021(10): 67-76.
- [26] 郑春风. 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基于 GH 乡的民族志考察. 新闻记者, 2022(2): 71-82.
- [27] 夏瓦.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刘君, 李鑫, 漆俊邑,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 [28] 库尔德利, 赫普.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 刘洪育,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 [29] 王豪. 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互型”的生成逻辑及其困境.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5(5): 65-76.

- [30] 施颖婕,季诗雨,张涛甫. 作为不平等再生产闭环的数字鸿沟及其情境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交叉滞后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8):48-63+127.
- [31] 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等.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 [32] 胡翼青,李璟. 媒介生态学的进路:概念辨析、价值重估与范式重构. 新闻大学,2022(9):1-13+117.
- [33] 郑素华. 从“旧”童年社会学到“新”童年社会学——发展与争议. 学前教育研究,2023(11):1-17.
- [34] 辛静,杨小雅. “更有意思”的短视频:儿童媒介化日常生活异化研究. 新闻与写作,2022(6):41-51.
- [35] 郑春风. 中国乡村儿童的手机实践与问题反思——基于童年社会学视角的田野考察. 新闻大学,2023(3):15-27+119-120.
- [36] 叶敬忠,王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劳动力乡城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 农业经济问题,2018(7):14-22.
- [37] 郑素侠. 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行动的视角.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4):125-130.
- [38] 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 [39] 张雪霖. 数字时代的亲密关系变革:90后小镇青年的家庭再生产困境. 中国青年研究,2024(8):5-13.
- [40] 萨布拉玛妮安,斯迈赫. 数字化的青年:媒体在发展中的作用. 雷雳,马晓辉,张国华等译.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 [41] 鲍曼. 流动的现性. 欧阳景根,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The Socialization Dilemma and Governanc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from a Mediatization Perspective

Zhang Xuel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tional tran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subjec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evolved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these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rawing on mediatization theory, this study, based on fieldwork in Hubei, Liaoni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posits that the socialization dilemma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s not merely attributable to the parent-child separation, but rather lies in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and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socialization ecosystem by smartphones as the “meta-medium”. The algorithmic logic and instant feedback mechanism of digital media, intertwined with social changes such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 urb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hollowing out of communities, present a dual effect of “compensation” and “alienation” within the three core fields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digital media has become a key structural force shaping the socialization path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 addressing this socialization dilemma necessitates a paradigm shift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amily-centrism” blame model toward a new “mediatization governance” approach emphasiz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Only through this shift can an inclusive support system be established to fost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smartphones; mediatiz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ization; family

■收稿日期:2025-09-15

■作者单位:张雪霖,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肖劲草